

第一章 緒論

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臺灣再度回歸中華民國統治，臺灣人在高度期待之下，1947 年卻發生「二二八事件」。該事件以 2 月 27 日專賣局緝煙員在臺北市查緝走私私煙事件為導火線，28 日部分臺北市民請願示威，並罷工、罷市。當日又發生公署衛兵槍擊請願民眾，乃由請願懲兇變為對抗公署，進而激化為省籍的衝突。此一抗爭與衝突迅速蔓延全島，使原本單純的治安事件變質為政治運動。¹行政長官陳儀一方面與處委會斡旋；一方面向中央政府請求派兵鎮壓。軍事鎮壓結束，臺灣省警備總部在接下來的清鄉運動中逮捕許多事件參與者。5 月 15 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臺灣省政府，新任省主席魏道明蒞任，此一事件才於 16 日告一段落。該事件不僅使不少臺籍士紳與地方菁英喪生，²且導致許多無辜民眾財產的損失及牢獄之災，事件後政府的處置也未見妥善，因此 1987 年解嚴後，隨著言論自由逐漸開放，「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或其家屬，要求政府公佈事件真相及給予平反或適度賠償，學界也開始注意此一課題並進行研究討論。截至目前，「二二八事件」的全貌已勾勒出大致的輪廓，但對該事件的參與者，除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有較多的研究之外，針對其他社會階層深入研究者甚少，青年學生是其中之一。當時在社會失序、政府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各地有不少青年學生自發性的組織治安隊，出面維持地方治安，後來卻遭政府視之為暴徒，加以圍剿。光復初期學制有何改變？學風如何？何種時代背景促使學生勇於參與「二二八事件」？事件結束後，政府對各級學校的整頓措施如何？參與該事件的學生遭遇如何？乃是本論文欲探討的課題。

由於各地中等以上學校參與「二二八事件」程度不一，欲進行全

¹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2 月 20 日，初版 9 刷，頁 405。

² 楊淑梅，《光復初期臺灣的社會菁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6 月。頁 93-97。

臺性的討論，無論時間或人力均有所不足。高雄中學曾於「二二八事件」中成為南部反抗軍警群眾的聚集地，該校學生亦與其他幾所學校組織學生聯盟，警總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檔案中保有一份在高雄中學搜得之「臺灣革命軍高雄支隊（學生軍）」組織表，因此出現當時該校有組織學生軍的說法。鑑於此一特殊性，本論文以高雄中學作為研究的對象。高雄中學歷史悠久，該校成立於 1922 年（大正 11 年），是高雄地區最早設立的中等學校，校名「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1944 年，高雄州增設第二中學於左營，該校更名為「高雄州立高雄第一中學校」。1945 年臺灣光復，12 月該校奉教育處命令，更名為「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兼收初、高中學生，是為完全中學。1947 年受「二二八事件」影響，奉命與高雄第二中學合併，9 月改稱「臺灣省立高雄中學」。1962 年 8 月實施省辦高中，初中部停止招生，1964 年 7 月最後一屆初中生畢業，該校成為高級中學。1970 年 8 月奉臺灣省政府命令改名「臺灣省立高雄高級中學」。1979 年 7 月隨高雄市升格為院轄市，該校改歸高雄市政府管轄，更名「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³經歷 1945~1947 年的政權更迭，高雄中學學制及學風有何轉變？該校師生為何會響應「二二八事件」？事件中該校師生如何因應？高雄中學為何會成為高雄要塞司令部提早出兵的鎮壓目標之一？軍事行動結束後，要塞司令部及高雄市政府如何持續綏靖及恢復高雄市秩序？高雄中學復課過程及曾參與「二二八事件」師生的遭遇如何？在在都是本論文擬探討的問題。希望針對高雄中學在「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研究，對學生參與該事件及事後官方的處置有適切的了解。由於高雄中學校名經過多次變動，故以下內容提及該校，日治時期稱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日治末期至光復之初未與二中合併前統一以一中稱之，此外，一律簡稱高雄中學。

欲了解高雄中學隨中日政權交替所產生的學風變化，必須藉助日

³ 參見 <http://www.kshs.kh.edu.tw/history.htm>。

治時期總督府及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有關臺灣中等學校學制之規定。除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臺灣省通志》、高雄市文獻委員會出版之《高雄市志》教育志、1938 年之《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一覽表》、1939 年之《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同窗會》、1946 年臺灣省立高雄第一、二中學《接收清冊》、1945~1946 的《總務類卷宗》、人事室《服務證明書》、《學籍管理》等檔案、行政長官公署公報、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發行之《臺灣一年來之教育》中有關教育之相關規定、光復初期之報紙、雜誌外，日治時期至光復初期曾就讀高雄中學之日籍校友 1968 年以後定期在日本發行之《高中同窗會會報》，以及臺籍校友對高雄中學的就學回憶均具參考價值。當中尤其珍貴者為目前仍保留於高雄中學檔案室的一、二中《接收清冊》、《總務類卷宗》、人事室《服務證明書》、《學籍管理》等學校與教育處往來公文，以及當時的報紙雜誌、校友之訪談記錄。從行政長官公署發行之公報及宣傳書籍，僅得知學制轉換之相關規定及過程，看似順利，其中出現的困難，包括師資缺乏、學生對於教材、師生等種種改變產生的適應問題，均須透過以上資料分析，才能了解高雄中學的實際情形。

臺灣光復後，不同於大陸其他淪陷省區，不設省政府而設行政長官公署，由陳儀出任長官，並賦予訂定單行法規之權，擁有軍權，以便應付特殊的環境。不少臺灣人認為國民政府仍視臺灣為殖民地而心生不滿，加上陳儀治臺後，衍生不少問題，各界不斷反映仍遭漠視，民怨不斷的高漲，終於因為緝煙事件引爆全臺的政治抗爭行動。欲探究「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必須先了解光復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體制實施的種種問題，以及當時官方與人民之間所產生的隔閡。除了行政長官公署公報及其宣傳委員會發行之新臺灣建設叢書（主要目的為宣傳行政長官公署治績）、臺灣省參議會 1946-1947 年開會記錄外，尚可從當時之報紙得知上述問題。中日戰爭結束後，臺灣報業在政權過渡時期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言論自由，雖然當時部分報社由行政長官公署指派人員接收，因而成為官方機關報，但有更多知識分子投入

辦報行列，利用報紙關心時局、為民喉舌、批評時政，言論毫無禁忌，廣泛報導戰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所面臨的問題，這些具有批判性的報社自然成為「二二八事件」中政府查封、停刊的主要對象，所幸當時發行的報紙多數已由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以微捲方式收藏，莊東方出版社也複印出版部分報紙。由目前可見之當時報紙資料，配合行政長官公署之施政內容，正可突顯當時的種種問題，了解「二二八事件」發生前的時代背景。

「二二八事件」距今 56 年，相關之資料、人士部分仍在，由於事涉敏感，解嚴之前並無公開之討論或研究，僅透過私下口耳相傳。解嚴以後，雖然研究者企圖探索，卻在資料零散不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未能窺知此事件概況。首先著手進行相關資料蒐集整理的為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8 年開始進行各縣市的耆老採訪工作，進一步於 1990 年成立「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工作專案執行小組」⁴，繼續進行相關人士的採訪，並分函各相關機關提供檔案，相繼於 1991 年 11 月、1992 年 2 月及 1994 年 2 月出版《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內容包括口述紀錄、檔案資料、相關文獻及因「二二八事件」死亡或失蹤者時間、地點資料等。

其次，總統府資政邱創煥於 1990 年 9 月 19 日完成「二二八事件專案調查報告」，簽報總統作為決定政策的參考。⁵同年 11 月 29 日行政院在總統指示下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由副院長施啟揚擔任召集人，同日召開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會中議決：為撫平歷史傷痕，消弭省籍間誤會，另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根據國內外有關資料，撰寫「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諸於世。因此 1991 年 1 月 17 日正式宣佈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以陳重光、葉明勳為召集人，任務為對「二二

⁴ 簡榮聰，弁言，《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年 11 月，頁 2。

⁵ 許雪姬，行政院二二八工作小組的分工與資料搜集，《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12 期，1991 年 9 月，頁 80。

八事件」做全面性之調查研究，以一年時間撰寫成報告，作為政府處理此一事件之參考。「研究小組」下設「工作小組」負責主要調查工作，賴澤涵擔任召集人，聘請臺灣史研究者吳文星、許雪姬、黃富三、黃秀政、陳寬政等人為研究員，於 1992 年 2 月 22 日公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該報告除了徵集臺灣現有的政府檔案，研究人員並分赴海外及大陸地區蒐集相關之珍貴檔案，是「二二八事件」研究第一手史料首度蒐集較完整者。⁶研究小組將徵集之所有史料交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經整編後，目前已出版《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6 冊。

關於國家檔案的蒐集、典藏，首推國史館，其中，也典藏部分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史料，該館在 1997 年 2 月 28 日出版《國史館藏二二八檔案史料》上、中、下，3 冊。此一套書著重於了解事件期間公家機關及國營事業的損失及賠償問題，可對照其他相關史料，以了解各地暴亂情形。

雖然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行政院主持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國史館均投入「二二八事件」相關檔案文獻蒐集、整理或口述工作，但由於人力、物力及時間上的限制，加上時間先後不一，也沒有統籌規劃的機構，部分檔案出現重複徵集，部分則因檔案列為機密文件未能公開。當中尤以《「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至為可惜，雖然動員行政力量搜集政府機關的檔案，但是行政院專案時間緊促，仍有史料不足，以致不少問題無法解答之憾，其中，與事件相關之學校資料即付諸闕如，而無法適切了解青年學生在事件中的角色。1999 年，通過「檔案法」，其第 22 條規定「國家檔案至遲應於三十年開放應用」，2000 年 3 月國家檔案局籌備處成立後，隨即辦理二二八事件檔案的搜尋與整理工作，搜集對象不惟中央政府機關，尚遍及地方政府、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外交部、國防部，以及國安局「拂塵專案」等，大多是

⁶ 賴澤涵總主筆，前引書，前言，頁 9-10。

當年政府處理該事件的公文書。⁷搜集的檔案比「二二八事件」工作小組更為全面，有助於對該事件的後續研究，目前國家檔案局正陸續將整理典藏的檔案以機關為單位分冊出版中。

藉由官方檔案以了解當時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處理原則及措施外，訪談與該事件相關的人物，或參考見證者的私人回憶錄，亦是取得史料的重要途徑之一。惟此二者均受限於個人的經驗與遭遇，加上主觀意識，以及時間久遠、空間轉換，導致對該事件之史實或論點出現記憶不全或偏差之因素，受訪者更可能因為個人因素，或對政府主導的研究工作心存疑慮而有所保留，都是分析訪談結果必須考量的變數。截至目前為止，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之《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內容即是以相關人士的訪談為主，檔案為輔。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工作小組也完成受難者本人、受難者家屬、及見證人等 300 餘人次訪談，整理成稿 120 餘萬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自 1988 年起，亦從事「二二八」口述史訪問工作，並將訪問記錄 75 篇刊登在 1992、1993 年 2 月出版之《口述歷史》第三、四期「二二八事件」專號。⁸民間方面，另有多位學者陸續投入二二八口述資料採集，如張炎憲、沈秀華等人以田野調查陸續整理出宜蘭、基隆、嘉義、臺北等地的二二八口述採訪。也有部分二二八受難者或其家屬，如阮美姝挺身出版傳記或回憶錄資料，將自身經歷告知世人。⁹1994 年 3 月，高雄市政府為了挖掘、保存二二八事件相關史料，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小組）簽下「高雄市二二八受難者口述歷史」計劃，在 1995 年 2 月底出版《高雄市二二八事件相關人物訪問紀錄》。¹⁰以上口述或

⁷ 洪溫臨，〈檔案挖掘與真相探索－近年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的徵集與分析（1991－2001）〉，《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30 期，2001 年 6 月，頁 81-84。

⁸ 侯坤宏，〈「二二八事件」有關史料與研究之分析〉，《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16 期，1994 年 6 月，頁 41。該文誤以為南部有 75 篇，實則《口述歷史》第三期刊登南部 32 篇，第四期刊登全省各地共 43 篇。

⁹ 洪溫臨，前引文，頁 77-78。

¹⁰ 許雪姬、方惠芳訪問，吳美惠等人紀錄，《高雄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年 2 月初版，序言，頁 2。

回憶錄均是研究「二二八事件」中，可與官方檔案印證的珍貴史料之一。

至於學界的研究成果，政治因素使然，早期論述二二八的書籍多在海外發行，由於缺乏一手史料，使得這些論述書籍或帶有個人臆測、或有目的的批評政府。¹¹學術界第一本論及「二二八事件」的著作應為李筱峰的《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書中列有專章討論「二二八事件」。賴澤涵、馬若孟(R. H. Myers)及魏萼合寫之《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一書，則是較有系統探討該事件的學術著作；近年來對此一事件之研究亦有不少文字發表。上述著作雖各有其貢獻，還是未能大量參考第一手資料，以致論證基礎稍嫌薄弱，學術信度略嫌不足，加上解嚴以來，上述之口述歷史、見證人的回憶錄等大量出現，其史實和論點有待驗證、剖析者為數不少。¹²另外，《「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著重於事件的背景、爆發與衝突、政府的肆應與事件平復、傷亡與受害情況、當時的救卹等內容，該書最大的貢獻在於首度大量徵引政府二二八檔案，輔以不少口述資料以修正官方檔案偏頗的立場，加上執筆者均為國內研究臺灣史頂尖學者，又經多位專家表示意見，資料之豐富，執筆之嚴謹，超過以往二二八研究成績。¹³不過由於檔案收集有其侷限性，口述資料受人為因素影響，故此一事件仍有諸多課題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本論文既以高雄中學與「二二八事件」為研究題目，討論的時間著重於日治末期以迄 1947 年 5 月 15 日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結束為止，探討的問題包括高雄中學光復初期的學風、師生如何因應「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以及事後的遭遇。因此參考資料來源以上述之《臺灣省通志》、《高雄市志》、1945~1947 年官方之公文檔案、出版品、當時的報紙、高雄中學校友及「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或其家屬及見證者之

¹¹ 洪溫臨，前引文，頁 72。

¹² 賴澤涵總主筆，前引書，前言頁 11。

¹³ 洪溫臨，前引文，頁 80。

口述紀錄、目前尚存於高雄中學之 1945~1947 年檔案及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前人研究成果為基礎。特別說明的是，國家檔案局雖已徵集與「二二八事件」相關的學校檔案，包括高雄中學在內，但是目前高雄中學檔案室中仍有少數與政府往來的文書，內容與二二八事件有關，可見檔案徵集過程仍有部分疏漏之處，此一缺失是日後研究「二二八事件」中有關學校及學生之課題必須注意者。

本論文除了緒論、結論外，本論文共計四章，第二章探討高雄中學經歷日治時期的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1944 年更名為高雄州立高雄第一中學校，到光復後第二度更名為省立高雄第一中學校的過程中，學制、教學內容、師生的轉變，學生面對此一變局，思想及行為表現有何特色。第三章由光復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的問題，及當時南部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發展，探討「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事件爆發經過，高雄市及高雄中學的因應。第四章論述政府的綏靖辦法及作法，並深入討論政府對高雄地區及高雄中學校園的整頓措施。第五章討論全省綏靖工作告一段落後，政府對學生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方法，一中與二中合併、第三度更名為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後，校方如何配合教育處規定，整頓該校學生？一、二中師生在「二二八事件」中，無論有無組織學生軍，傷亡原因及情形如何？是否有師生因參與「二二八事件」導致被捕，無法就業、就學，甚或生活遭政府監控，影響其日後之政治立場等。